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浪子回头主题 与东正教人道主义思想^{*}

万海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浪子是欧美成长小说和考验小说中的常见形象,浪子回头主题往往体现着人道主义精神和基督教的感召力量。学术史上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研究,往往主要关注娜塔莎这一位浪子形象,而小说中实际上存在诸多程度不同的浪子,有的已经回归,成为所谓的“逆来顺受的人”,有的不甘心回归,仍挣扎于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多位浪子的命运的安排,不但引发了读者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群体的人道主义同情,也受到了民主派对小说宣扬隐忍顺从、逆来顺受的激烈批评。作家的东正教人道主义思想在竭力求得一种平衡,即:在彰显作为浪子的社会底层人物的个性意识觉醒的同时,又不希望他们叛离俄国传统的东正教根基。因此,小说既具有浪子回头的广泛意义,又打上了作家赋予这一主题的独特东正教人道主义意识的烙印。就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结合而言,浪子形象和浪子回头主题对凸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作家创作之路上承前启后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陀思妥耶夫斯基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浪子; 浪子回头; 东正教人道主义

DOI:10.13458/j.cnki.flatt.004611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19)04-0121-10

浪子(prodigal; блудный сын)是欧美成长小说和考验小说中的常见形象。基督教中浪子回头(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блудного сына)的故事出自《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的比喻”。在这里,耶稣讲了三个比喻,浪子回头是其中的最后一个:小儿子向老父亲索要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家产后远走他乡,放浪形骸。最后他迷途知返,回到家中,与父亲相见。当他以为自己罪不容赦的时候,父亲用慈爱宽恕了他,他也因此获得心灵的重生。

从圣经中可以看出,浪子回头主题通常由四个阶段的情节组成:离家、浪荡、忏悔、回家,一般必须包含堕落(道德犯错与违法行为)与忏悔(悔过、自新)这两个基本要素。浪子回头金不换,浪子回头主题往往体现着不离不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基督教伟大的感召力量。浪子回头主题既是成长小说的重要要素,也是具有说教性和劝善性的一种特殊寓言,其教化功能不言而喻。

陀思妥耶夫斯基(下文有时简称陀氏)作品中的浪子主题,其雏形最早出现在他为拟将写作的幽默文集《爱开玩笑的人》(Зубоскал,1845)的构思中:主人公出生在莫斯科的东正教宗法制家庭,少年时却在彼得堡接受西方的科学教育(Достоевский,1978:6-7)。就生平早期而言,陀氏表现得也像个浪子:在父母相继离世后,为了辞职后能专心从事文学创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项目编号:15ZDB09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万海松,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与文化,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作者邮箱:wanhaisong@sina.com

com

作,他多次要求分割遗产,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不惜为此与兄弟姐妹等亲人闹翻,自认为违背从小接受的宗法制教育,“大逆不道”:“姨夫大概认为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恶棍(изверг)……妹妹和妹夫也许把我看作一个怪物(чудовище)……大人们恐怕会对孩子们说我是一个败家子(мот)、放荡鬼(забудыга)、懒汉(лентяй),要他们别学我这个坏榜样”。(Достоевский,1985:104)

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ённые》)完成于作家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后的19世纪60年代,作家的个人经历使它蒙上了浓厚的自传色彩。有学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60年代的所有活动,无不具有浪子归来的痕迹”(Габдуллина,2010:226)。的确,小说虽然讲述了一群身处社会底层的民众与命运及代表社会罪恶势力的上层人物合力抗争的故事,但小说中多数底层人物都或多或少具有回头浪子的性质,他们的犯错、忏悔与回归中的每一步都体现出作家的东正教人道主义思想,折射出作家呼唤人民回归俄国根基的初心与夙愿。

2. 小说中的浪子形象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里既有男的也有女的浪子,既有彻底回归也有尚未回归的浪子,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浪子,小说几乎是一个浪子形象的大画廊。

娜塔莎是小说中真正意义上的浪子,而且是一个思想犯罪多于行为犯罪的女性回头浪子形象;此外,还有一个主要通过间接叙述描绘出来的回头浪子形象,即涅莉(叶莲娜)的母亲。作为主人公的管家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也是一个回头浪子的形象。他本来有自己的田产,拥有很多农奴,但在骠骑兵团的第六年,因为一夜赌博而输光了全部家产,第二天又用唯一的财产——一匹马,通过赌博赢回了自己的小村庄,虽然也损失不少农奴。但他从此戒赌、金盆洗手,绝口不再提此事。因此,他在小说中被树立为最终接受浪子回归的慈父形象,也是与冤家瓦尔科夫斯基相反的正面人物。

小说中的其余人,大多是程度不等的浪子。比如阿廖沙,他是背叛者与私奔者合二为一的形象,虽然有时也因冲动而犯错,但很快就承认错误、回归父亲身边,可以说是浅尝辄止、对原生家庭伤害最小的浪子形象。其实阿廖沙本质上也是代表纯洁幼稚的理想主义的巨婴。为伊凡·彼得罗维奇收留涅莉之事而感动的密探马斯洛博耶夫,也可以说是一个浪子,“在某些紧要关头,他们由于自身的软弱,往往会有意识地去干违背良心的事。他们一再沉沦下去,而且自己早就知道,他们正走向毁灭”(陀思妥耶夫斯基,2010:177),但他却在拯救涅莉的事情上非常卖力,被爱感召,他也愿意回归到正常的家庭生活。

小说塑造了处于不同阶段的浪子,有已经回头(回归)的与未回头的,可能回头的和绝不会回头的。浪子回不回头,当然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浪子不愿回归,或许说明浪荡生涯对他们的吸引力非常之大,或许表明他们与过去、与原生家庭做切割的决绝心态。可能回头的,预示着未来有希望得到家庭和亲人的拯救;绝不回头的,就会处在永恒的浪荡与漂泊中,象征着既拒绝自己的过去,又无望得到救赎的一类特殊的“多余人”。在近代俄国文学中,浪子一旦缺失回归的情结,不再回到父母的身边,还表明在外来社会思潮的冲击

下,俄国传统的宗教伦理业已面临严重的挑战。

如果按浪子所挥霍的对象来细分的话,浪子形象还有“物质浪子”与“精神浪子”之分,一般而言,前者挥霍的是钱财,后者挥霍的是别人给予其的信任与同情等恩情,前者大多属于施予侮辱者,如希佐布留霍夫,后者大多属于被侮辱者,如一度极其任性的涅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大多数主人公都是程度不等的浪子,但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不属于浪子,他代表了引诱浪子离家叛道的诱惑者或黑恶势力。原因有二:首先,他不喜欢挥霍,却热衷于不择手段地积累财富,甚至通过攀附权贵、利用婚姻和爱情等手段,毫不顾忌社会伦理底线地为自己谋取物质财富。“公爵不仅不喜欢挥霍,甚至还深谙生财之道。”(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24)其次,他有一贯的实用主义原则和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冷酷无情,而这一般并非浪子的性格属性,因为浪子偏重于释放娱乐本性,放浪而不是约束自己的言行。正如阿廖沙对父亲的评价:“你们都是一些讲求实际的人,我们有那么多过了时的原则,既严厉又苛刻的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252)

小说中的浪子之所以能够“回头”除了他自己认识到错误和勇于悔过自新之外,还因为上帝的启示与眷顾,以及亲人的永不放弃;即使放弃他们在法律上也无可厚非,但在道德上、亲情上他们大多不会觉得自己“仁至义尽”。一般的普通百姓,都对浪子怀着不放弃、不抛弃的仁慈和博爱,把浪子看作是自己人:“一个受尽生活折磨的最卑贱的人也是人,而且是我的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38)这跟作家创作于同一时期的报告文学类长篇小说《死屋手记》中对“不幸的人”的看法一脉相承:“‘不幸的人’一词蕴含着基督教的人性本恶的原罪思想,即人的与生俱来的罪性和犯罪动机:‘我们其实也是有罪的’。……而把罪犯称为‘不幸的人’实则是一种共同承担罪责的人道主义精神”(万海松 2018:34)。这体现了俄国东正教传统中的共罪思想和命运共同体意识。

3. 浪子回头主题的宗教内涵

自圣经之后,文学作品对浪子回头母题进行了形形色色的演绎,但万变不离其宗是其教喻功能,这对人物的成长和性格的养成既是一种警示和劝善,也是对作为回归浪子的出发点与归宿处的父母和家庭的褒扬。浪子回头故事的寓意并非仅局限于文学领域,更贴近于大众百姓的日常生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浪子回头主题,既有世俗的普适功能,也带有其特殊而深刻的宗教意义。

首先,跟其他自然派作家的作品相比,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开始有了尊严的觉醒和个性的意识,他们有时甚至不惜代价、用反常的手段彰显自我,重拾已经丧失殆尽的个体存在感。“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声称,对那种一辈子遭受压迫和屈辱的人来说,渴望表现自己个性(尽管这对他人和自己都有害)的强烈本能常常显得比真理和正义的理想更为重要”。(弗里德连杰尔,1997:43)以《穷人》为例,主人公杰武什金在“感到自己是一个人以后”,就“开始向自己和其他人提出了果戈理的主人公头脑里从未想到过的要求”(弗里德连杰尔,1997:43)。在浪子们背离传统、远走他乡等情节中,已经可以看出俄国民众在现代化浪潮下呈现出现的新动向:伴随着个体意识之觉醒的,必然是反抗精神之萌动。比如,杜勃罗

留波夫就认为这种背离是一种独立意识,表明人的主动精神的觉醒:“现在主动精神,即人的独立活动,独自进行工作的能力,却站在第一位了,——对人的价值的评判,也根据他身上的主动性达到什么程度,根据它的倾向如何来决定。大家都努力要做一个独立的人,认为依靠别人的恩典而生活已经和自己不相称了”(杜勃罗留波夫,1984:472)。但是,个体不顾社会世俗传统而一意叛离的个人主义和唯我主义,在作家的笔下几乎都被当成大同小异的利己主义。在陀氏眼中,利己主义就是只爱自己,不管是所谓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还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它们统统都与美德、理想和真正的爱无关。

其次,浪子所背叛的家庭其实象征着俄国东正教传统,亦即俄国人民的故园与根基。浪子们曲折的经历与小说跌宕的情节几乎无处不表明:东正教传统伦理价值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疗救功能。回头浪子的出走、堕落与回归桥段,其重点落在最终回归上,最根本的目的是彰显东正教传统伦理价值对个体的巨大感召力。就此而言,来自福音书的浪子原型,与陀氏所定义的“俄国漂泊者”其实是同义词,正如评论家所说:“脱离了自己家园并‘败光自己产业’的俄国知识分子,在寻找真理时又在世界里迷失,与此同时,他们要想获得真理就必须回归‘故土家园’,即回到‘祖国根基’,从陀氏的思想来看,这类知识分子的行为与‘浪子’十分类似”(Габдуллина 2005:21)。而且,浪子只有回头,他的经历才具有价值和启示作用,否则他就只能沦为一个终生的浪子和败家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面典型。因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就具有浪子回头这一叙事母题最宽泛的象征意义,即每个人都是浪子:“整个人类,‘集多样化于一身’的亚当——就是一个浪子,他在堕落后离开了天父,投身于充满恶的世界,在经历了痛苦、磨难、迷茫后,最终拜倒在天父威权的脚下。”(Чернов,1994:152)

第三,陀氏笔下的浪子通常都是地位低下的普通百姓,大多属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们本身来自俄国社会传统的根基,因此,他们的背叛对传统根基的伤害也最大。在福音书中,浪子一般都有较多的兄弟姐妹,老父亲并不会因为个别子女的出走而变得愤怒与颓丧,因为其他子女仍是老人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而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里,娜塔莎是父母的独生女,她的离家出走,对渐入晚年境地又备受官司折磨的双亲,更是加倍的精神打击:不但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打输了与仇家的官司,更由于女儿的私奔对象竟然是仇家的儿子,更何况不谙世事的女儿一意孤行,对自己面临着随时会被始乱终弃的危险居然完全不屑一顾。伊赫缅涅夫在偷偷写下的书信里,对女儿的思念与愤怒、宽容与谴责此起彼伏,纠缠难解。老父亲面对回归的女儿,第一句话就是“我的朋友!……我的生命!……我的欢乐!”这三个词,准确地亮明了独生女在他心中的定位。

小说中两位女性浪子背离传统和家庭的方式往往是选择私奔,一走了之。她们的遭遇说明,遇人不淑、不相称的婚姻导致了特别悲惨的结局,她们为背离传统和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是生命。即便如此,自堕落之始她们其实一直未远离救赎。娜塔莎一开始离家私奔,其父母就基本上奔波在促使她认识错误、悔过自新的劝善之路上。父辈对出走浪子的诅咒,在一定程度上,是绝望的劝善,其目的仍然是希望浪子的最终回归。史密斯老人在女儿卷款私奔的最初,也一直追随着女儿的踪迹,更多的是担心女儿被骗;在受到作为生活唯一希望的女儿的伤害后,他诅咒女儿的命运,永不接纳女儿的忏悔和回归,可后来又默默

地接受女儿的女儿,这种彻骨切肤的恨与爱仿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史密斯在初步接纳自己的外孙女后,对其施教的教材是一本《新约全书》和本地理书。此中寓意不言自明:地理书是为了让孩子更好地认识周围的环境和整个世界,《新约》是为了教育孩子学习耶稣为人处事的道理和自我牺牲精神。

第四,在浪子回头主题中,实现堕落与被救赎这两个情节的主体和主因都是浪子本人:浪子们的堕落主要是因为内心躁动、不够安分;浪子们只有不自暴自弃,低下高傲的头颅,悔过自新,才能得到救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救赎。

对于浪子之所以堕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倾向于认为人物的内心和性格是主因。个体的堕落,原因主要在于自己,其次才是社会环境。作家不同意把人的堕落和犯罪归因于环境,他认为人的精神、修养和气质因素要远远大于物质和环境因素。例如,瓦尔科夫斯基在与娜塔莎的谈话中透露,他与娜塔莎父亲的诉讼官司,仅仅是因为他本人的性格造成的:“我同您家的这场争执,也许仅仅是我这种不幸的性格造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150)在作家看来,“环境决定论”倾向于将一切对个人不利的因素归罪到社会和环境的头上,认为别人或者环境才是这些罪恶的元凶,一旦个人犯了罪却不用承担任何的法律和道义责任,这样一来,不但会使罪行得不到惩处,反而更容易让罪犯愈加堕落,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作家担心的不仅是社会环境的恶化,他更忧虑纵容“环境决定论”泛滥将直接导致人的内心普遍变得空虚,人们不再相信最高的上帝,失去了上帝,也就失去了上帝的威慑作用,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早晚将趋于崩溃的边缘。

最后,鉴于对“环境决定论”的驳斥渗透着东正教的内省原则,陀氏信守“凡谦卑者才能上天堂”这一说法。来自于外部社会环境的欺凌,发源于人物内心世界的谦卑,这两者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构成了既二元对立又合二为一的格局。法国作家纪德认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虽然是陀氏创作前期的一部作品,但“他的全部作品中一直贯穿着这个思想:侮辱使人下地狱,谦卑使人圣洁”(纪德 2017:46)。具体而言,“侮辱使灵魂堕落、弯曲、变形、干枯,刺激灵魂使之凋谢。侮辱导致精神伤害,这是很难治愈的”(纪德 2017:45)。作为地位卑微的小人物,其内心世界一般遵从谦卑原则:“谦卑包含一种自愿的顺从,它是被自由地接受的,它体验到了《福音书》的真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纪德, 2017:45)因此,陀氏让笔下小人物选择谦卑和自尊自爱,不愿意让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他们也去侮辱和损害别人。陀氏笔下的浪子回头主题呼吁内心(特别是小人物)的谦卑,以成就社会的和谐: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不反抗外部凌辱,只求内心谦卑,这也是杜勃罗留波夫在《逆来顺受的人》里批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根本原因:“那么,这些不幸的、逆来顺受、受尽屈辱、受尽诬蔑的人的处境,就应当是毫无出路吗?他们可以做的,就只有沉默,忍耐,还有,变成一块肮脏的抹布,把自己的默默顺从的感情掩藏在最模糊的褶皱里吗?”(杜勃罗留波夫,1984:485)

4. 小说中的东正教人道主义观

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又译博爱主义、基督凡人论),是重视人类价值——特别是

关心最基本的人的生命、基本生存状况——的思想。关注的是人的幸福,强调人类之间的互助、关爱,与重视人类的价值。相对的,另有重视神类、重视自然类或者重视动物类等的思想主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思想既有启蒙运动以来欧洲人道主义传统的因素,也有俄国东正教的影响和他自己赋予人道主义思想的新内容。究其实质而言,其人道主义是一种独特的人学(hominology)或人学主义(anthropologism; антропологизм),亦即对待处于神性和兽性之中间状态的人和人性的态度。

19世纪俄国文学中表现出的人道主义,大多是有神论的人道主义,或者说是与基督教对立的人道主义。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与西欧文艺复兴意义上以无神论思想为主的人道主义不同,俄国的人道主义多强调“人性问题”、“人高于所有制原则”,同时又带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印记(别尔嘉耶夫,2004:93)。因此,将《被侮辱与损害的》中体现的人道主义直接称作东正教人道主义较为客观和方便。小说中作家的东正教人道主义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既有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多为穷人)的无限同情,也有对施予侮辱者的有力控诉。尽管娜塔莎和涅莉母亲既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但她们又都属于浪子,而小说更多表现的是她们作为前者的一面。“对于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怜悯和同情,是俄罗斯的人很重要的特征”(别尔嘉耶夫,2004:88)。作家的常见主题是苦难与同情,“俄罗斯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苦难和对受苦人的怜悯折磨得精神失常。苦难和同情成为他的作品的基本主题”(别尔嘉耶夫,2004:89)。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陀氏没有探索笔下浪子们堕落的心理缘由:小说对“淫乐”的嬉笑怒骂式批判最为典型,因为“淫乐”是浪子和施于侮辱者们共同的追求。

所谓“淫乐”指的是“这种对一切崇高、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的公然嘲笑……这种发自内心的魔鬼般的哈哈大笑,最后这种有意识地糟蹋一切不容糟蹋的东西——而且这一切都干得肆无忌惮,简直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哪怕最狂热的脑袋也不敢想象,有人竟放肆到如此程度——这种淫乐最鲜明的特点,主要就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2010:349-350)。对“淫乐”的批判,其实就是对不信神、不敬神、没有敬畏的恣意妄为心理的否定,与圣经中毁灭索多玛和蛾摩拉是一个道理。

其次,小说在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涅莉及其母亲那种“受苦的利己主义”的同时,又颂扬无私之爱、仁爱和博爱。在陀氏看来,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皆与美德、理想和真正的爱无关。

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提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的批驳,是陀氏东正教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借瓦尔科夫斯基之口,调侃、讽刺这种“合理的利己主义”:“如果我确实知道,构成人类一切美德的基础是极端的利己主义,那叫我怎么办呢?一件事情越是合乎道德,其中的自私成分就越多。爱自己——这是我承认的唯一准则”(陀思妥耶夫斯基,2010:351)。瓦尔科夫斯基口中对“合理的利己主义”的定义,远离了无私之爱,滑向绝对的自私自利,已经与爱无关,实则是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和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我不过是个凡夫俗子,所以我要说,看待事物应该用最简单、最实际的观点。比方

说,我早就摆脱了一切束缚,甚至一切责任和义务,只有在这些责任能给我带来某种好处的时候,我才认为我有这些责任”。(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351)

小说宣扬乐善好施的无私之爱。“好人做事从来不考虑是不是以前得到过别人的好处……即使没有得到过好处,他们也乐于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个世界上好人还是很多的。你没有遇见他们,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碰到过一个好人,这只能说是你的不幸。”(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371-372)娜塔莎之所以能在最后回归父母身边,除了她对阿廖沙的幻想破灭外,主要还是因为伊赫梅涅夫夫妇对女儿始终不渝的爱,而与娜塔莎的回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涅莉的早夭,良心泯灭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一手造就了涅莉及其母亲和外公的不幸命运,但凡公爵有一点点基督式的爱,他就不会使涅莉的母亲落得如此下场,就不会肆意羞辱对自己有功的伊赫梅涅夫一家。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也就是难觅基督式的爱的时代里,哪怕是来自最普通人的简单之爱都不失为一剂治疗时代痼疾的良药。

小人物有时候会用所谓的“受苦的利己主义”心理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这是个性觉醒的底层人物对社会和命运的一种特殊反抗方式。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里,这类个性觉醒的例子就是涅莉,她虽然受到伊凡·彼得罗维奇等好心人的收养,有了食物和温暖的住所,但她还是宁愿去外面沿街乞讨,也不愿就此依赖上恩人们的施舍。因为“她受尽屈辱,她心中的创伤无法愈合,于是她似乎故意用这种令人不解的举动,用这种对大家的不信任,来竭力刺激自己的伤口,似乎她以痛苦为乐,以这种受苦的利己主义(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为乐。这种刺激伤痛并以此为乐的心理我能理解:许多受到命运摧残、感到命运不公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都以此为乐”(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388)。在这里,涅莉们的反常举动仅用利益和理性来解释,似乎说不通。他们看似无福、无力也无心享受这些从天而降、与其原来身份不符的恩惠,想要从原来的生活开始,一步步重拾之前在受压迫、被欺辱的经历中屡遭打击的个性和尊严,以及几乎消失殆尽的个人存在感,以至于反而不惜对这些好心人施加言语和行动上的暴力,伤害他们的一片好心。这些底层人物看似反常、实则合情合理的举动的描写,缘于作家对人物所受的精神创伤的深刻洞察,正体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人道主义思想的独特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深化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们的尊严观。正如苏联陀学家弗里德连杰尔所指出的:“所以,一个人在想‘造福’于他人之前,常常应该公正地、仔细地衡量一下自己的动机,应该确信自己能够去帮助别人,而且同时又不会以自己的优越感去伤害别人,不把令对方痛苦的贫困意识(或对自己的‘恩人’的新的难以承受的义务)强加于别人。……施恩于一个人,就意味着使他蒙受侮辱;只有摆脱掉外来的庇护,感觉到自己是个按照自己的信念和本能在行动的、用自己的双腿坚定地站着的人以后,他才能感到自己是个真正幸福的人”(弗里德连杰尔,1997:45-46)。

第三,仇恨与宽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具有血缘遗传和反向作用力的特点:爱(亲)人,(亲)人爱你;恨(亲)人,(亲)人恨你。这两种对待他人的不同态度,也决定了史密斯父女与伊赫梅涅夫父女的不同命运。史密斯对女儿的仇恨与不宽恕,被自己的外孙女

涅莉所继承:面对涅莉质问他为何不肯原谅自己的女儿即涅莉的母亲时,正在跟涅莉一起阅读福音书的史密斯不禁再次怒火中烧,将涅莉赶出了家门并随即搬家换了住址;涅莉母亲对始乱终弃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仇恨与不宽恕,又被他们的私生女涅莉所继承。涅莉在去世前所说的话让人难以释怀:“你还要告诉他,我不久前读了福音书,书上写着:要宽恕你所有的仇人。我读了这句话,可还是不愿宽恕他,因为妈妈临死前还能说话的时候,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诅咒他!’所以我现在也诅咒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妈妈而诅咒他……”(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481)

第四,过分自尊与高傲就意味着与社会传统伦理的拒斥与自我隔绝,这也是陀氏东正教人道主义思想所反对的。自尊的极端就是高傲,而高傲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不谦卑、不原谅,更容易走向与社会和周围人隔绝的边缘。小说中的史密斯老人及其女儿和外孙女就是在高傲中死去的。史密斯因为女儿的私奔而不原谅女儿,女儿因为瓦尔科夫斯基的背叛而选择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涅莉则因为这两个缘由而怨恨外公、敌视周围的世界。母亲在去世之前告诫涅莉:“你就是再穷,一辈子受穷,也不要去向他们,不管谁叫你去,也不管谁来找你,你都别跟他去。你本来也可以出入这些地方,做个富家小姐,穿上漂亮衣裳,但是我不愿意你这样。他们既狠毒又冷酷,听我的话:永远做个穷人,去干活,要不就去讨饭,要是有人来找你去,你就说:我不愿意跟你们走。”(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440)这段话如果排除掉“你”和“你们”就是特指瓦尔科夫斯基的话,说明涅莉母亲对周围人和整个世界的绝望与怨恨之深。然而,她对这个社会的弃绝只是单方面的、不现实的,因为即便是她和女儿愿意以讨饭为生,也是需要依靠这个社会的施舍才行。她在临死前对女儿的另一次告诫,就显示出这种高傲心理的矛盾性和不可持续性:“讨饭并不可耻,因为我不是向一个人讨饭,我是向所有的人讨饭,而所有的人并不是一个人。专向一个人讨饭是可耻的,向所有的人讨饭并不可耻……”(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385)

第五,陀氏的人道主义思想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既承认理想主义是年轻人的同义词,又凸显理想主义对纯洁社会风气的必要性。在小说中,幻想家和理想主义者的代名词常常是“席勒的老弟”、“席勒式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347)、“席勒式的难舍难分”(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392)等。别尔嘉耶夫曾指出,陀氏“在这个时期(即写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时期——引者注)他还是个‘席勒’。后来他喜欢用这个名字称呼心灵美好的人,一切‘美好而崇高的’东西。对人的同情,对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人的同情,在那时业已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激情。”(Бердяев 2002:353)

陀氏不赞同简单而粗暴地否定年轻人的理想主义,这种否定大多出自瓦尔科夫斯基之口。后者无情地驳斥了儿子阿廖沙那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豪言壮语,认为阿廖沙等一帮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一方面大谈对人类的爱,热衷于探讨全人类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对爱情犯罪,而且对罪行熟视无睹——这简直不可思议”(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259)。他批判阿廖沙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如同犯罪,实质上是变相肯定自己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肯定自己为任何利益都甘愿铤而走险、不择手段。

当然,反面人物所反对的,即为作家所肯定的。小说对席勒主义的褒扬,基本上是通过

瓦尔科夫斯基对席勒式人物的揶揄和嘲弄表现出来的。“在我的身上还有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性格特征——那就是我憎恨所有这些庸俗无聊的、一钱不值的天真烂漫和田园牧歌，我最感兴趣的一大享受是：起先我装模作样，学着他们的腔调，百般爱抚并鼓励某个永远年轻的席勒，然后一下子把他吓呆：我在他面前霍地扯下假面具，挤眉弄眼，把原先热情洋溢的脸变成一副鬼脸，就在他始料不及、不知所措的时候，再对他吐出舌头来”（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342）。弗里德连杰尔高屋建瓴地指出：陀氏作品所提及的“席勒”与“席勒精神”其实表明了俄国文学与现实“水乳般融为一体”，是俄国文学的文史相通性的一个缩影，已成为“一种大容量大能量的‘永恒的’文化—历史概括”。（弗里德连杰尔，1994:279-280）

第六，作家的东正教人道主义还体现在正常的家庭对于重塑正常社会伦理的重要性。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偷偷写下的给出走私奔的女儿的信中，老父亲伊赫缅涅夫表达了对正常家庭之回归的渴望：“只有到那时，当你在‘家庭的氛围内’，规规矩矩地过上一种模范的新生活之后，我们或许决定饶恕你。”（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399）从浪子回头主题的圣经原型可以知道，代表和维护社会理论的一般是家庭的长者，他们的态度决定了浪子能否最终顺利回归家庭。伊赫缅涅夫最终宽恕私奔女儿的结局，与史密斯至死也未宽恕私奔的女儿的结果，形成了两个父亲形象的鲜明对比。

5. 结语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运用浪子回头这一经典的叙事母题，在彰显作为浪子的社会底层人物的个性意识觉醒的同时，又不希望他们叛离俄国传统的东正教根基，这就是作家的东正教人道主义在小说中的真实体现。小说既具有浪子回头的广泛意义，又打上了作家赋予这一主题具体而独特的东正教人道主义意识的烙印。

就表现人道主义思想的方式和内容来看，《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呈现出作家早期与中后期创作的诸多过渡性特征。它与早期小说《穷人》等在题材和语言上相似之处颇多，但在艺术上还有许多缺点和不受，但在思想上却标志着陀氏与俄国“自然派”文学的渐行渐远。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环境决定论”，呼吁内心（特别是小人物）的谦卑与社会的和谐，这跟“自然派”文学把社会问题的发生机制导向追问社会制度的缺陷及其改革，特别是诉诸农奴制改革，已是分野所在。难怪杜勃罗留波夫在《逆来顺受的人》中指责该小说未能考察瓦尔科夫斯基个性描写中“使问题得到协调、得到解决的原则”，即：“公爵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的？最使他感兴趣和激动的是什么？他怕的是什么呢？最后，他又相信什么呢？”（杜勃罗留波夫，1984:431）

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开始，已经出现了跟陀氏创作后期五大思想小说（即《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思想家型主人公的形象瓦尔科夫斯基，比如，他与娜塔莎的谈话就充分暴露了其作恶多端的本性，但其形象却被有的批评家认为是该小说中“最突出、最完整、最忠于生活和现实的典型人物”（Евгения Тур，1861:576；

转自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78:530)。而瓦尔科夫斯基“这种甚至不加掩饰的厚颜无耻的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许多的主人公所具有的一个显著特点。”(巴赫金,1998:97)而有的批评家则认为,陀氏笔下脱离俄国东正教文化根基的“俄国漂泊者”的原型就是浪子,他们是浪子“在精神上的复兴与变容再现”(Габдуллина, 2010:232)。由此观之,由浪子回头主题开始,作家创作中关于善与恶、正与反的思想交锋,以及关于知识分子和“多余人”漂泊与回归的根基主义思想论争,在小说中才刚刚掀开序幕。

参考文献:

- [1] Бердяев Н. 2002. Откровение о человеке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A]. *Смысл творчества: Опыт оправдания человека* [C]. Харьков:ФОЛИО;М.: АСТ.
- [2] Габдуллина В. 2005. «Блудный сын» как модель поведения: Евангельский мотив в тексте биографи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J].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Филология)»* 6 (49):16 – 22.
- [3] Габдуллина В. 2010. «Блудный сын» и «русский бездомный скиталец»:Идея притчи о блудном сыне в публицистик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A].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C]. СПб.:Наука, Т. 19: 280 – 318.
- [4]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1978.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т. Т. 3* [M].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 [5]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1985. «Письмо» М.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му (Ноябрь 1844. Петербург) [A].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т. Т. 28.* [C]. Л.: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 [6] Тур Евгения [Салиас Е. В.]. 1861. «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ённые», роман г.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N]. *Русская Речь* 89 (5 ноября).
- [7] Чернов А. 1994. Архетип «блудного сын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 века [A].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Вып. 3:Евангельский текст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VIII – XX веков: цитата, реминисценция, мотив, сюжет, жанр* [C].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ПетрГУ.
- [8] 巴赫金. 2009. 万海松等译. 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 [A]. 巴赫金全集. 第七卷 [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9] 别尔嘉耶夫. 2004. 雷永生 邱守娟译. 俄罗斯思想 [M]. 北京:三联书店.
- [10] 杜勃罗留波夫. 1984. 辛未艾译. 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论文选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11] 弗里德连杰尔. 1994. 陆人豪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 [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 [12] 弗里德连杰尔. 1997. 施元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13] 纪德. 2017. 桂裕芳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 [M]. 北京:北京出版社.
- [14] 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 艾腾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4卷).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15] 万海松. 2018. 《死屋手记》中“不幸的人”与东正教认同感 [J]. *外国文学研究* (2):34.

tively located a proper name and a pronoun, either congruent or incongruent in gender. After reading the whole sentence,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answer a yes-no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reference of the pronoun. The results of reading time showed that cataphoric pronouns were resolved more rapidly than anaphoric pronouns in the first clause, but were resolved more slowly than anaphoric pronouns in the second clause. The results of co-reference judgment were in par with the reading time. We posit that the differences originated from the different lexical and 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of pronouns and proper names. Furthermore, L2 readers adopted different processing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pairs of referents (i. e., name-pronoun vs. pronoun-name): bonding and evaluation for anaphoric pronouns and active search for cataphoric pronouns.

Key Words: anaphoric pronoun; cataphoric pronoun; pronoun resolution; the Discourse Prominence Representation Model

“Sobornost” and the Grotesque Realism in Russian Literary Classics p. 101. XIAO Jingyu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thodox spirit and the Russian literary classics,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studies of Grotesque Realism in the Russian literary classics often benefit from Bakhtin’s Theory of Grotesque Realism, but ignore its specific cultural background. “Grotesque Realism” was put forward by Bakhtin in his study of Francois Rabelais’ works in the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 in Europe. According to him, Grotesque Realism originates from the culture of folk humor. Sinc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Rabelais’ creation are set against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we should not copy Bakhtin’s study on Rabelais in the study of this literary phenomenon, but should see it in the light of Bakhtin’s “Great Time” i. e. in the context of Russian culture. In view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ulture, “Sobornost” is the fundamental source of Grotesque Realism, closely related to its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The idea of “Multi-culture co-existence” is the essence of “Sobornost”. This study suggests the significance of Bakhtin’s theory of “Great Time” in literary research in general.

Key Words: “Sobornost”; Grotesque Realism; Russian literary classics; culture of folk humor

Pushkin in the Reviews of N. N. Strakhov p. 111. ZHU Jiangang

N. N. Strakhov is not so famous in the reviews of Pushkin. But I argue that his articles about Pushkin, especially *the Notes about Pushkin and others* published in 1897, have revealed the greatness of the poet. Nevertheless, the valuable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close reading could enrich our knowledge of Pushkin. Pushkin’s contribution, which is revealed by Strakhov, to satirical parody an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spiritual heritage is still valuable for research today.

Key Words: Strakhov; Pushkin; parody; the family chronicle

The Theme of “the Prodigal’s Return” and the Orthodox Humanitarianism in *Humiliated and Insulted* p. 121. WAN Haisong

As a common theme in the *Bildungsroman* and “the novel of ordeal”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culture,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usually embodies the spirit of humanitarianism and the appeal of Christianity. While Natasha is the prodigal *par excellence* that has often come under scrutiny in the study of *Humiliated and Insulted*, there remain some prodigal variations that have received much less if not no attention: the so-called “resigned”—resigned oneself to adversity and the so-called “unreconciled”—still sunken in the mire of various shades of egoism. Dostoevsky’s treatment in the novel of the fate of those prodigals arouses in the readership not



only a humanitarian sympathy for the “humiliated and insulted” ,the disadvantaged ,but also a fierce criticism on the part of the “democrats” who have little patience with the alleged advocacy of resign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The point to see is: Dostoevsky ,out of his Orthodox humanitarianism ,attempts here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highlighting the awakening of the underprivileged prodigals’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expressing a wish that those prodigals remain rooted in the Russian Orthodox tradition. The universal image of the prodigal’s return is thus branded with a unique humanitarian spirit of the Orthodox Church. In this sense ,the artistic treatment of the prodigal theme as realized in *Humiliated and Insulted*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transition in Dostoevsky’s writing career.

Key Words: Dostoevsky ; *Humiliated and Insulted* ; prodigals ; prodigal’s return ; Orthodox humanitarianism

Games and Divinity: Aesthetic Spiritual Exploration in the Creation of *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 ,p. 131. XIE Mingqi

Nabokov’s novel *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 is a highly controversial classic ,which has caused a long dispute between “non-Russian nature” and “Russian nature” in Russian emigrant literary circles. The writer himself called it “a violin in a void”. I argue that this kind of play or game is “divine” ,which is the spirit of religion. Readers can feel the spiritual divinity and the power of faith in the creation of these seemingly word games. Nabokov’s literary creation is to practice this unique view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to realize religious introspection in literary creation. Through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materialization of human group and the subjectification of individual ,the writer metaphorically criticizes the materializ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the subjective reality and embodies the religious spirit of the Russian nation. The spirit of “love” as the core can unify everything and make literary creation spiritua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reative metaphors and belief foundations in Nabokov’s literary games from the angle of religious philosophy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search path worthy of reference for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 *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 ; Nabokov ; creative subjectivity ; religious philosophy

Interpretation and Mechanism: *The Cathedral Clergy* and the Messianic Consciousness ,p. 139. LUAN Xin

The Cathedral Clergy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novels by the 19th century Russian writer Nicolay Semenovich Leskov. Embodied with the writer’s deep Orthodox complex and strong desire to improve the society ,the novel has aroused much notice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Orthodox Church on the theme of fiction and the novel’s reflection of real life from literary creation’s perspective have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 while the role that the Orthodox Church plays in the artistic form of fiction creation has been ignored. Taking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theo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Orthodox ideology ,the Messianic consciousness ,on the uniqu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e novel *The Cathedral Clergy*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means of visual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ideas of the Orthodox Church in the novel ,revealing ultimately ,the artistic charm of this classic work—the mechanism of meaning regeneration.

Key Words: Leskov ; *The Cathedral Clergy* ; The Messianic Consciousness ; ideas of the Orthodox Church

